

有一事諸 本欲相極與任德一

丁文江五趙丰田編 為中國實業前途

計改治前途計有極重要之一事焉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

(初稿)

曰鋼鐵業此事吾等志經營多年

朋輩中則劉厚生王持沙丁立君

諸人為其中堅多似索占全烟主及

之但查了知大資本不難免私者外

國人合辦不能消除國內種之阻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年谱长编系列
國人 中華書局

丁文江 赵丰田 编
欧阳哲生 整理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

(初稿)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年谱长编系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赵丰田编;
欧阳哲生整理. —北京:中华书局,2010.4
ISBN 978-7-101-06792-7

I. 梁… II. ①丁…②赵…③欧阳… III. 梁
启超(1873~1929) — 年谱 IV. B25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1371 号

责任编辑:俞国林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丁文江 赵丰田 编
欧阳哲生 整理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787×1092毫米 1/16·43%印张·6插页·780千字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定价:96.00元

ISBN 978-7-101-06792-7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年谱长编

弁 言

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教授,即通常所说的早期“清华国学院”里的四大导师,无论其道德还是文章,都早已成为中国近代学术的象征,曾经鼓舞过一代又一代的后学。

而今距离那个神话般的年月,已经过去了八十餘载,就连他们那些同样传为佳话的门人,也已悉归道山。不过,到这时反而看得更清了:尽管在国学院的众多门生中,同样不乏一代宗师,而且其总体学术阵容,更是令人啧啧称奇;然而,如果从格局与气象来看,仍然不能不承认:当年国学院里的这四大导师,仍然是难以逾越的高峰。

这令我们益增怀想。——到底是为什么呢?

至少我们可以说,他们在当时简直是无一例外,都属于最了解西学的中国学人;而一旦得到了这种世界性的框架,再回头来反观本土学术文化,眼光终究是大不一样了,于是故国传统在他们那里,就反而显得既值得坚守,又充满灵动和弹性。

但反过来说,他们在惯习的践行方式上,又多属于传统的儒者,还未曾受到“为学术而学术”的现代分工之割裂,所以值此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必能保有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忧患意识,这反而使他们的治学活动,有了强大的文化背景、道德蕴涵与心理动机。

正因为这样,在他们日常的教育功课中,也就隐藏着早期国学院之所以成功的奥秘——也就是说,即使是在无意之间,他们也是沿用了最适于教育中国文化的方式,来言传身教这种文化,而这种作为楷模的力量,势必会让其弟子们终身持守,不稍懈怠。

也正因为这样,在此后以学术为志业的薪火相传中,他们就表现为令人崇敬的起点与开山。而中国学术文化的现代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沿着他们开出的方向,才艰难地走出了近一个世纪的路程。既然如此,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步态,都值得认真地总结和发挥,也需要平心地检思与回味……

缘此,对于他们这四位特别的传主,哪怕是再详细的年谱长编,也绝不

会嫌长的。相反,我们会怀着感激的心情,去欣赏作者所能蒐集到的每一个细节,因为这四位前贤的生命历程,也正是早期国学院院史的宝贵缩影,足以让我们反刍寻味再三;此外,作为中国现代史上四位难得的文化通人,他们平生的修养与造化也都千姿百态、煞是好看。

只是,读到最后,每一部年谱的倏然而止,尽管是在痛定思痛之时,仍然让我们感伤不尽,追思不已。

这就是本院推动此一项目的理由。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二〇一〇年二月十一日

整理说明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和学者。其主要著作结集为《饮冰室合集》,生平事迹则见载于丁文江主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以下简称《梁谱》)。近代人物年谱虽持续不断有人撰著,但《梁谱》迄今仍享有盛誉,被视为同类体裁著作中的经典之作。在此,我们借新版《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出版之机,对是书的编纂、特点、版本和此次整理中的细则作一简要说明,以对该书的价值有一明确认识。

一、《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的撰写

丁文江(1887—1936)是《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的主编。他与梁启超相识于1918年底,当时梁启超组织考察团赴欧洲游历,经徐新六推介,丁文江得以加入该团。从此,丁文江进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圈子,与任公关系渐趋密切,二人在思想上相互磋商,在学术上互通信息,成为知交。梁启超归隐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对丁文江言听计从、颇为倚重,丁氏成为梁府的主要“幕僚”。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去世。“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这是丁文江在梁启超追悼会上所敬献的挽联,从这幅挽联可以看出他俩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梁启超的亲属故旧为纪念“这位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给后人研究评论梁启超提供基本资料,商议办两件事:一是编辑文集——《饮冰室合集》,由梁的朋友林志钧(宰平)负责”;“二是编一部年谱,为梁启超传作准备”,此事交给丁文江负责^①。这二件事,都是具有象征传承衣钵意义的大事。将整理文集一事交给林宰平,将编辑年谱长编一事交给丁文江,这样的安排究竟是出自梁启超的遗托,还是亲友们商量的结果,或是林、丁两人的自告奋勇,我们没有直接材料可证,但它明显反映了当时林、丁两人与梁启超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它象征着林、丁二人作为梁任公的传承人,继续延续梁氏的事业。丁文江去世时,周作人曾作挽联:“治学足千秋,遗恨未成任父传;赞闲供一笑,同调空存罗素书。”^②上联表现丁文江与梁任公的继承关系,下联表示丁、周对罗素《赞美闲暇》(*In praise of Idleness*)

^① 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前言》,收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② 《周作人致胡适》(1936年1月7日),收入《胡适全集》第3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52页。

一书的共同爱好。可见,丁文江作为梁任公的传人在朋友圈中已有所流传。

丁文江接受这一任务后,即着手搜集有关材料。因公开出版的梁启超著作,已交由林宰平负责整理,年谱须搜集的主要材料自然是未曾公开出版的梁启超的私人信札,这也是后来面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梁氏信札见长的缘由之一。

丁文江在与胡适通信中,详谈他为编纂《梁谱》、搜集材料的情形。1929年4月16日他给胡适的信中首次谈及他开始的这项工作:“连日为任公年谱事极忙,竟将地质研究放过一边,甚为忧闷。《知新报》已从北大借到,《湘报》、《湘学报》也觅得。报的一部分,已完全了。任公家中所发现的信不下千封,整理极费时日。任公自己的长信也有多种。材料不可谓不多,但各时期详略不一,真正没有办法。”^①过了一个月,5月21日他致胡适信中再次提到:“近来搜集年谱的材料日多一日,壬子以前的一千几百封信已将次整理好了。自光绪丙午到宣统末年的事实已经很可明白。”“朋友方面所藏的任公信札,也居然抄到一千多封,但是所缺的还是很多。”^②7月8日他向胡适汇报自己新的工作进展:“自从我上次写信以后,又收到许多极好的材料。任公的信,已有二千多封!有用的至少在一半以上。只可惜他家族一定要做《年谱》,又一定要用文言。我想先做一个《长编》,敷衍供给材料的诸位,以后再好好的做一本白话的‘*Life and Letter*’。”^③7月15日他致胡适信又详述为印刷《康南海自编年谱》,与时在燕京大学教书的顾颉刚商谈一事^④。8月13日他又提到:“任公的 Private 东西很多,都在我这里。我看过了,认为可供宰平参考的就送给他去。”^⑤在梁启超去世后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丁文江为撰写《梁谱》,除搜集梁启超本人的著述和私人信札等材料外,还收集与梁启超有关的报刊,如《知新报》、《湘报》、《湘学报》等;与梁启超交往密切的人物材料,如康有为日记、自编年谱、《驿舍探幽录》、孙慕韩兄弟孙仲屿的日记、蒋观云与梁启超来往书信等;他人撰写的纪念、追悼梁启超的文字等。丁文江为此工作劳累了半年多光景,可谓收获颇丰。由于这年冬天,他须率团去西南地区进行地质考察工作,搜集、整理梁启超年谱材料一事只能暂时搁下。第二年6月,丁文江结束西南地质考察工作,回到北平。1931年秋,丁文江就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研究教授,需要承担繁重的地质教学和研究工作,只好另寻助手,帮助他继续这项工作。

1932年暑假,赵丰田“到北京图书馆正式接手此项工作”。据赵后来回忆:“当时已经搜集到的梁启超来往信札有近万件之多,这是编年谱的主要材料。此外,还有梁几百万字的著作,以及他人撰写的有关梁的传记。要把这么浩繁和杂乱的资料梳理清楚,并编辑成书,任务是比较艰巨的。好在丁文江对此已有了比较成熟的

① 《丁文江致胡适》,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13—514页。

② 《丁文江致胡适》,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15—516页。

③ 《丁文江致胡适》,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20页。

④ 《丁文江致胡适》,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21—522页。

⑤ 《丁文江致胡适》,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32页。

意见,向我强调了下面几个主要之点:一、梁启超生前很欣赏西人‘画我象我’的名言,年谱要全面地、真实地反映谱主的面貌;二、本谱要有自己的特点,即以梁的来往信札为主,其他一般资料少用;三、采用梁在《中国历史研究补编》中讲的编辑方法,平述和纲目并用的编年体;四、用语体文先编部年谱长编。这最后一点与梁家的意见不同。梁的家属主张编年谱,并用文言文。丁文江觉得重要材料很多,先编年谱长编,既可以保存较多的材料,又可较快成书。他又是胡适的好友,很赞成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所以仍是坚持用白话文。”^①可见,在赵丰田介入《梁谱》的编纂工作以前,丁文江至少已经基本完成了材料的搜集工作,“刚粗加整理”,并对年谱的编写“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意见”。从我们现在看到的由丁文江授意并修订、赵丰田起草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可以看出丁氏当年主持此项工作的基本构想。丁文江的初期工作,为以后《梁谱》的编写打下了重要基础。这是《梁谱》工作的第一阶段。

从1932年暑假赵丰田开始参与这项工作,至1934年秋编出第一稿,抄成二十四册,约一百余万字,这是《梁谱》工作的第二阶段。为什么这时要选择赵丰田作为自己的助手呢?一是因为丁文江本人1931年秋就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研究教授后,担负沉重的地质学教学和调查研究的任务,“实无余力编辑《梁谱》”,故丁文江“就托朋友从北京高等学校中替他物色助手,帮他编辑《梁谱》”。二是赵丰田此时“正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学习,曾撰作《康长素先生年谱》的大学毕业论文,对康有为和梁启超作过一些研究”。燕大研究院院长陆志韦和史学系教授顾颉刚遂推荐了赵氏给丁文江作助手,帮助丁文江继续编纂《梁谱》。关于此事,顾颉刚先生在回忆中如是写道:“1929年,予任教燕京大学,赵君丰田从予治古史,予察其资性适于治当代史,适康同璧女士以其父杂稿一箱畀予整理成书,遂以交赵君,尽一年之力成《康长素先生年谱》一篇,载入燕大《史学年报》。其文为丁文江先生所见,颇加赏誉。时梁启超没未三年,其子女辈以其书籍及稿件悉数捐献北平图书馆,为丁先生所见,慨然以梁氏年谱自任。然其所任职务弥众,梁氏稿件又繁,力不能胜,遂又商之于予,借赵君之力以竣其功。”赵丰田本人也说:“回忆我1932年秋应丁文江之邀从事《梁谱》编纂时,还是一个年仅二十七岁的青年,这是我结束学生生活、走向社会后所从事的第一件工作。”第二阶段主要由赵丰田阅读和选定所需资料,“再将选录的资料按年分类连缀起来,定出纲目,加上说明性的或论介性的文字,显现谱主在有关年月中的主要活动”。丁文江则“不定期地前来了解编辑情况,及时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意见”^②。第一稿出来后,丁文江认为篇幅太大,要赵丰田“大加删简后,再送给他审阅”。

1934年6月丁文江就任中研院总干事后,赵亦于1935年初从北平移居南京中研院,以就近丁文江,便于工作,赵对第一稿“进行删削”。1936年1月5日丁文江

^① 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前言》,收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页。

^② 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前言》,收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页。

去世,翁文灏“接替主管《梁谱》编辑工作”,至1936年5月赵完成了第二稿,约八十万字(赵丰田估“六七十万字”)。这是《梁谱》工作的第三阶段。第二稿定稿后,“由翁文灏根据丁文江的原意,题名为“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五十部,每部装成十二册,发给梁的家属和知友作为征求意见之用”,这就是我们现今能看到的最早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丁文渊称“蓝晒本”)。

从《梁谱》工作的三个阶段来看,第一阶段主要由丁文江本人承担,第二、三阶段他扮演的是主编和指导者的角色,赵丰田任其助手,从事具体编纂。从丁文江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留下的批注,以及赵丰田本人的回忆可以见证这一点。

在当时并不便利的环境中,林宰平、丁文江二人切实履行他们的使命,表现了他们对梁任公的忠诚。在近代中国,许多政治、文化名人的身后事,除非有强势的政治集团作为背景依托,否则极为冷落、进展维艰。《饮冰室合集》和《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幸赖林、丁二人的鼎力撑持,得以出版或告竣,可以说是一个例外。

二、《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撰写的特点

主持编纂《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是丁文江在历史学领域为人推重的一项工作。这项工作明显贯彻了丁氏的个人意图和他对《梁谱》的构想。解读《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通览《梁谱》,我们即可见出其不同于以往年谱的特别之处:

第一、搜集材料以积聚书信见长。年谱之撰写创始于唐宋,发达于明清。然在年谱中以聚积未刊书札见长,且篇幅之大空前未有,这是《梁谱》的一大特色,也是它面世后受到学界特别重视的原因所在。采用这种方式撰写《梁谱》的一个原因诚如《例言》第二条所揭:“本书采用英人《赫胥黎传记》(*The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Henry Huxley*)体例,故内容方面多采原料,就中尤以信件材料为主。”也就是说,丁文江在设计《梁谱》时,参考了西方传记撰写体例,这一外来因素也就是《梁谱》区别于传统的年谱的特质所在。关于《梁谱》的这一特点,书前的《例言》有关书信的处理有多条特别说明,如第三条:“本书所收材料虽以信件为主,但以其离集单行,故凡信件中所无而著述中所有者,亦酌量采录。其信件中所有而著述中亦有者,或一并录入,俾相互发明,或仅列其目供读者参考,借求不失年谱之价值。”第四条:“本书所根据之信札,凡六千余件(电稿凡三千余件),而所采录之重要信札亦逾数百件。其中有任公先生与人者,有人与任公先生者,亦有他人与他人者,惟采录之标准,皆视其与任公先生及其事业有无直接或间接之重要关系而定。”第五、十二、十三、十四条对所收书信的处理亦有具体说明。

第二、采用白话文撰写。传统的年谱写作均用文言文,丁文江作为胡适的好友,他支持新文化运动,主张使用白话文撰写《梁谱》,这在年谱写作中也可以说是一种尝试。《例言》第廿二条对此有所说明:“本书叙述文字采用白话,惟以语文之分本无严格标准,故所用者,仅属现代通行之语体而已。”可见,采用白话文撰写

《梁谱》是适应时代潮流的产物。

第三、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采用分节叙述的办法。如《梁谱》1895年条分:(一)二月先生入京会试;(二)三月和议成,与南海联合各省公车上书陈时局;(三)新政情形;(四)七月创办强学会于京师;(五)交游。又如1898年条分:(一)入京;(二)俄索旅、大事件;(三)开保国会于京师;(四)请变科举运动;(五)徐致靖之奏荐;(六)诏改八股取士旧制;(七)先生之被召见;(八)改《时务报》为官报;(九)革礼部六堂官职;(十)擢用四京卿;(十一)政变之作;(十二)遁逃。这些小标题对梁启超本年各个月份的活动有画龙点睛之用。这种按小专题分节叙述的方式,在年谱写作中可以说也是一个创试。这种方式,显然更易掌握谱主某年的主要事迹。

第四、每年开首载有当年发生大事和对谱主本年事迹的综述。前者可帮助读者了解时代背景,后者则便于读者对谱主当年事迹有一提纲挈领的了解。

第五、创设“年谱长编”这一体裁。丁文江原有写作一部“新式的《梁启超传记》”之打算,“为了搜集这部大传记的资料”,他先将收集到的资料整理、编纂成一部年谱长编。这样一种想法,可能是从胡适那里得到启发。梁启超去世时,胡适结合教学需要,正在撰写《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以为其所拟撰写的《中国中古思想史》作准备。《梁谱》采用“分节叙述”、每年先对当年发生的大事和谱主本年事迹作一简要交待,这样一种写法,实有其为传记作准备的意味。《梁谱》篇幅之长,为此前年谱之未有,盖因其为一资料长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作为年谱长编的创试,对后来的学者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历史学者撰写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近代历史人物年谱时,亦喜采用这样一种体裁,如胡颂平编撰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汤志钧编撰的《章太炎年谱长编》、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即为接踵《梁谱》而来的后起之作,在体例上,它们明显依循《梁谱》的轨辙。

但《梁谱》诚如其最初题名——“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毕竟还只是一部稿本,内中明显存有需要进一步修订、改善之处。1958年台北世界书局出版《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时,胡适在该书的序中写道:“这部《长编初稿》的主编人是丁文江,编纂助理人是赵丰田。每年先有一段本年的大事纲领,然后依照各事的先后,分节叙述。凡引用文件,各注明原件的来源。”“但这部《长编初稿》是大致完成了的一部大书。其中最后的一小部分是在君死后才完成的。”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梁谱》(油印本)来看,应该说它还是一部未完成的“大书”,全书至“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公历1900年)先生二十八岁”这一年,的确是“依照各事的先后,分节叙述”的做法处理,此后的年份则只有1908年如此处理。其它年份则未见“分节叙述”的情形了。《例言》第廿三条“本书原拟为《大事年表》及《人名录》两篇附载于后,兹以时间仓卒及篇幅过多之故,未能编入,拟俟再版时补缀”,第廿四条“本书除信件材料不便亦不必再作目录外,为便于读者参考计,将引用及参考书列一目录,附于全书之后”,这两条均未及完成。可见后面的整理、修订工作尚未及进行。胡适当年阅读时,还发现《梁谱》“因为原料实在太多,赵君句读标点也不免偶有小错误”。尽管如此,胡适当年仍大加褒奖和推荐这部书:“正因为这是一部没有经

过删削的《长编初稿》，所以是最可宝贵的史料，最值得保存，最值得印行。”^①

三、《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各个版本

现在有关《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著先后出版有三个中文版本、一个日文译本，兹分别简介如下：

(一)《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简称“油印本”)。即1936年5月完成的第二稿，约八十万字，油印五十部，每部装成十二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4月出版的《北京图书馆藏年谱珍本丛刊》，其中第一百九十三至一百九十六册即据该本影印。这个版本的优点是原稿存真，缺点则是原稿中的错误或问题一仍其旧。据赵丰田后来阅读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油印本”称：“从陈叔通先生赠给上海图书馆的那部《初稿》上可以看出，直到1948年，征求修改意见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这部《初稿》上面有梁启超生前好友陈叔通、何天柱、贾毅安和亲属梁启勋、梁思成、梁思顺批注的文字数十处，提出应予删改的资料数百处。”除资料收录所存问题外，引文、书信和句读标点的问题亦复不少。

(二)《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简称“初稿本”)。1956年11月台北“中研院”为纪念丁文江逝世二十周年曾出版《丁故总干事文江廿周年纪念刊》。与此同时，“中研院”新址落成，将其所收藏的所有图书陈列于历史语言研究所。承董作宾帮助，将史语所收藏的“油印本”借出，世界书局杨家骆愿“出资重抄，代为出版”，终使埋没二十余年的“油印本”重见天日。1958年世界书局据“油印本”正式出版，书名题为《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书前有胡适的《序》和丁文渊的《前言》。“初稿本”对“油印本”作了部分编辑、整理，订正了“油印本”中所存的错讹字。但编排不佳，阅读不便；《梁谱》中所引用书信的误植甚多，吴铭能博士撰著的《梁启超研究论稿》(台北：学生书局，2000年版)所附《台北世界书局版〈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后记》，据《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中华书局，1994年版)对“初稿本”中引用的梁启超家书作过校勘，订正之处达154条，足见该版问题不少。

(三)《梁启超年谱长编》(简称“长编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据该书的《编辑说明》第一条“《梁启超年谱长编》系据《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36年，油印本十二册)修订而成”，第二条“本书的修订原则是，在不变动原书的内容和结构的基础上，作适当的增补和删改；增补侧重于信札和有关谱主的重大史事，删改仅限于与谱主无甚关系的少量资料及部分编述文字”。此书是由赵丰田和其助手根据“油印本”修订而成，书名改题“梁启超年谱长编”。该书精装一册，书前有照片14页，顾颉刚作《序》，赵丰田撰写《前言》。据辛建《〈梁启超年谱长编〉简介》一文交待：“新增资料中主要是解放后陆续发现的未刊或散见于其他

^① 胡适：《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收入丁文江主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世界书局，1958年，第3、4页。

书刊的梁氏信札。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在《时务报》时期及稍后的几年内致汪康年书信多件,这有助于进一步研究《时务报》及梁、汪关系。”“关于后期的重要信件中,有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为稳定袁氏反动统治、分化革命派而竭诚献策的上书;在反袁护国战争中,据记载梁氏曾连续致蔡锷八书,《初稿》只录其第二书,这次增补了第一、三、四书,其中第一书是初次与读者见面,为研究梁在护国战争中运筹帷幄之功,增添了新资料。”“此外,还节补了少量学术方面的书信和文章。”^①“长编本”较“初稿本”在编排上有很大改进,故比较便于阅读。

(四)《梁启超年谱长编》日译本,此项编译工作的主持者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学士院会员岛田虔次(1917—2000年),狭间直树、井波陵一、森时彦、江田宪治等京都大学教授参与了这项工作,岩波书店2004年11月出版,共五卷。此书第一卷前有编者的《凡例》、《编辑说明》。第五卷后有《补注(第一卷—第四卷)》、《解说》(狭间直树)、《跋语》(井波陵一)、《人名总索引》。每卷前有照片,后有《注》、《文献目录》、《中国人名表》、《外国人名表》,其中《注》的部分有些注释系采用日本方面特藏的资料。从体例上说,日译本反较中文各版完备,实现了原主编丁文江对《梁谱》的基本构想。而从每卷后面所附的《注》可以看出编译者所下的功夫之巨,不能不使研究梁启超的中国学者对日本学者为《梁谱》所做的工作之细致感到叹服。“日译本”实具有中文各版所不具有的特殊的文献价值,值得中国学者参考、借鉴。

我们此次整理出版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油印本”为底本,参校台北世界书局的“初稿本”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长编本”,并在此基础上又作了新的修订,修订的原则是:一、保持原稿内容不变;二、主要是对文字刊误;三、对原稿某些引文误植据原作加以校订;四、对“初稿本”和“长编本”所出现的文字歧异酌加“编者注(按)”说明;五、对“油印本”的某些错误加“编者注(按)”订正;六、“油印本”原有的“江注”(丁文江注)和其它注释则一仍其旧;七、“初稿本”、“长编本”所新加的某些“注(按)”酌情保留;八、书名改题《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九、书后新增《人名索引》,以便检索使用。

至于我们在整理《梁谱》中存在的问题,尚祈学界同人指正。

欧阳哲生

2009年4月28日于北京蓝旗营

^① 辛建:《〈梁启超年谱长编〉简介》,载《史学月刊》1984年第5期。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

- 一、本书所收材料尚待删补，故暂定名为《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
- 二、本书采用英人《赫胥黎传记》(*The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Henry Huxley*)体例，故内容方面多采原料，就中尤以信件材料为主。
- 三、本书所收材料虽以信件为主，但以其离集单行，故凡信件中所无而著述中所有者，亦酌量采录。其信件中所有而著述中亦有者，或一并录入，俾相互发明，或仅列其目供读者参考，借求不失年谱之价值。
- 四、本书所根据之信札，凡六千余件(电稿凡三千余件)，而所采录之重要信札亦逾数百件。其中有任公先生与人者，有人与任公先生者，亦有他人与他人者，惟采录之标准，皆视其与任公先生及其事业有无直接或间接之重要关系而定。
- 五、本书所录信件，皆言明系某年月日某人与某人书于后或叙述中。其仅有年无月或仅有月无日者，皆不可考之件，原件中有月日者已属甚少，其注明某年者十不得一，故多由编者编定。其言春夏秋冬或某某月间者，皆编者不得已之概括词耳。
- 六、本书所录著述材料中除文章及已经发表之信札外，其诗词之有关先生言行思想者，亦酌量采录。
- 七、本书所录著述方面之材料，皆注明出处。其仅言出自某书不言卷页者，皆原书所无。
- 八、本书于著述材料方面除已采录者外，更列其比较重要者之目录于后，以便读者参考。至其编年，多据乙巳本《饮冰室文集》、乙丑重编本《饮冰室文集》及《饮冰室合集》目录(稿本)，亦有据编者考订而改正者。此外或注明见于某书某卷某页，以便读者检查。
- 九、本书于叙述方面竭力免除批评及主观或左右袒之文字。但所收材料范围广博，凡有关任公先生个人及其事业之各方面皆经收录，虽有驳杂之嫌，实寓“画我象我”(paint me as I am)之意。
- 十、本书主旨在尽量表现任公先生之言行思想及其事业，惟学术方面以性质属于专门，不必求全数读者之了解，故材料及叙述中或简略述及或仅列其目。
- 十一、本书所收材料有录全篇者，有节录者，有仅择录一节或一段者，其节录择录之材料上下以“……”号表示之。
- 十二、本书所收信札中多有旁注者，今为印刷便利计，凡比较重要须加采录者，皆以小号字移印行内。
- 十三、本书所收信札材料，因原件多系行书草书，颇多不易辨认者，故凡遇此等情形

皆以□代之,其有避忌、不便明书者亦然。

十四、本书所收信札材料中,于人名记事颇多隐秘处。今于人名方面,就编者所知,略言其重要者;记事方面,以篇幅所限,不能详为说明,读者阅读全书后,自可知其大概。

十五、本书所收材料虽经一再校正,仍留若干讹误之处。其原因有二:第一,原材料中本误,为保持其本来面目计,故不加改易;第二,抄本材料有误,而以原本材料不在编者手头,无从校改,暂亦仍之。

十六、本书于记载时事——谱主的背景及时人两类,理应甚详,但以限于篇幅,只择其重要者约略言之。

十七、本书依从任公先生《年谱及其做法》^①之主张,作为“谱前”一章,列于书首。惟“谱后”一事,则以先生时代过近,暂付阙如。

十八、本书格式,平叙、纲目两体并用。至有纲无纲,全由编者斟酌其情形为之。

十九、本书于所引材料中遇有讹误或须注明处,有时加按语以说明之。

廿、本书于记载年月日为便利计,宣统三年以前采用阴历,民国元年以后采用阳历,惟材料中阴阳月日如有不可考者,则概括编入之。

廿一、本书纪年,于本国年代下以小号字注明公元,以便读者参考。

廿二、本书叙述文字采用白话,惟以语文之分本无严格标准,故所用者,仅属现代通行之语体而已。

廿三、本书原拟为《大事年表》及《人名录》两篇附载于后,兹以时间仓促及篇幅过多之故,未能编入,拟俟再版时补缀。

廿四、本书除信件材料不便亦不必再作目录外,为便于读者参考计,将引用及参考书列一目录,附于全书之后。^②

廿五、本书所收材料虽已甚多,但恐仍有未足,至于体裁格式,亦恐未尽妥善,倘蒙读者赐以补充及纠正,不胜感幸。

^① 编者注:此文收入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五章,商务印书馆1930年4月初版。

^② 编者注:《例言》所谓“将引用及参考书列一目录,附于全书之后”,“油印本”原缺。

目 录

整理说明	欧阳哲生	1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		1

谱 前

先世 附世系表		1
祖父母		1
父母		4

正 谱

同治十二年癸酉(公历 1873)先生一岁		7
光绪二年丙子(公历 1876)先生四岁		8
光绪三年丁丑(公历 1877)先生五岁		8
光绪四年戊寅(公历 1878)先生六岁		8
光绪五年己卯(公历 1879)先生七岁		8
光绪六年庚辰(公历 1880)先生八岁		8
光绪七年辛巳(公历 1881)先生九岁		9
光绪八年壬午(公历 1882)先生十岁		9
光绪九年癸未(公历 1883)先生十一岁		9
光绪十年甲申(公历 1884)先生十二岁		9
光绪十一年乙酉(公历 1885)先生十三岁		10
光绪十二年丙戌(公历 1886)先生十四岁		11
光绪十三年丁亥(公历 1887)先生十五岁		11
光绪十四年戊子(公历 1888)先生十六岁		12
光绪十五年己丑(公历 1889)先生十七岁		12
光绪十六年庚寅(公历 1890)先生十八岁		13
光绪十七年辛卯(公历 1891)先生十九岁		15
光绪十八年壬辰(公历 1892)先生二十岁		17
光绪十九年癸巳(公历 1893)先生二十一岁		18

光绪二十年甲午(公历 1894)先生二十二岁	19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公历 1895)先生二十三岁	22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公历 1896)先生二十四岁	30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公历 1897)先生二十五岁	36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公历 1898)先生二十六岁	47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公历 1899)先生二十七岁	80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公历 1900)先生二十八岁	91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公历 1901)先生二十九岁	131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公历 1902)先生三十岁	136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公历 1903)先生三十一岁	157
光绪三十年甲辰(公历 1904)先生三十二岁	172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公历 1905)先生三十三岁	179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公历 1906)先生三十四岁	183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公历 1907)先生三十五岁	194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公历 1908)先生三十六岁	228
宣统元年己酉(公历 1909)先生三十七岁	253
宣统二年庚戌(公历 1910)先生三十八岁	262
宣统三年辛亥(公历 1911)先生三十九岁	280
民国元年壬子(公历 1912)先生四十岁	318
民国二年癸丑(公历 1913)先生四十一岁	345
民国三年甲寅(公历 1914)先生四十二岁	356
民国四年乙卯(公历 1915)先生四十三岁	368
民国五年丙辰(公历 1916)先生四十四岁	385
民国六年丁巳(公历 1917)先生四十五岁	418
民国七年戊午(公历 1918)先生四十六岁	446
民国八年己未(公历 1919)先生四十七岁	457
民国九年庚申(公历 1920)先生四十八岁	469
民国十年辛酉(公历 1921)先生四十九岁	488
民国十一年壬戌(公历 1922)先生五十岁	500
民国十二年癸亥(公历 1923)先生五十一岁	517
民国十三年甲子(公历 1924)先生五十二岁	536
民国十四年乙丑(公历 1925)先生五十三岁	545
民国十五年丙寅(公历 1926)先生五十四岁	571
民国十六年丁卯(公历 1927)先生五十五岁	589
民国十七年戊辰(公历 1928)先生五十六岁	624
民国十八年己巳(公历 1929)先生五十七岁	642

附 录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	胡 适	651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前言	丁文渊	654
人名索引		659